

工业遗产：一个面向未来的论纲

严 鹏 孙 星 陈文佳

[内容摘要] 工业遗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概念与实践，最初是一种老工业区的乡愁凝结。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出发，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工业精神，可以被纳入产业政策，成为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循环重构的工具。从产业演化角度看，工业遗产是地区产业再造的一部分，应对工业衰退和去工业化等后工业问题。利用工业遗产开展劳动教育，是发挥工业遗产核心价值的有效途径。工业遗产应该也必须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工业遗产；工业文化；劳动教育；后工业

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概念与实践，是工业文化的一部分。工业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力量，以创新为内核，在革命性的历史进程中兴起；遗产是对往昔的纪念，以怀旧为表征，其存在恰是为了在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历史洪流中，保存某种旧日的事物。因此，工业遗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的构词。从遗产层面看，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工业遗产为数甚少，因为工业的遗存不仅距离当代过近，而且缺乏主流审美上的艺术性；从工业层面看，工业企业的发展往往必须破坏构成遗产的那些要素，如旧厂房的扩建与改造、设备与生产线的更新换代。在这种矛盾下形成的工业遗产，其最大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见证了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证据，工业遗产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如宫殿、庙宇、市镇、村落等）是完全等价的。然而，这种评判只是从遗产角度出发为工业遗产做出的辩护。事实上，站在工业的立场上，将工业遗产视为工业经济与工业文化演化的阶段性产物，将看到其更多与更大的价值。而这样一种工业文化的视角，将使工业遗产脱离纯粹的怀旧与乡愁范畴，成为面向未来的产业再造的一部分。

一、工业遗产：概念的形成与工业文化视角

工业遗产的认定与保护兴起于较早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但并未得到普遍认可。朱迪丝·阿尔弗雷(Judith Alfrey)和提姆·帕特南(Tim Putnam)认为工业文化(industrial culture)就是一种可以被管理的遗产。而工业遗产的管理，是指运用多种手段来展示过去的人们如何生活与工作。这些手段包括：搜集各种已经消失的工业的残余物来理解其作用；出于技术、历史或美学兴趣来保护与搬运工业建筑、遗址和机器；发现工业景观中那些多余的但不可替代的元素的新用途；修复废弃的机器和工作场所以重新利用；记录工业人群的知识、技能和经验。^①在他们看来，工

^① Judith Alfrey and Tim Putnam,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Managing Resources and U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

业文化是工业文明（industrial civilization）的核心与持续性预设。这两位学者并未清晰地定义工业文明，他们也没有对工业文化给出教科书式的定义。两位学者只是认为：“一个文明不能够认识自身是件可怕的事。”^①这一点突出了工业遗产在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性。不过，他们亦指出：“通常很难将工业文化视为一种遗产，因为传统上把遗产定义为前工业历史时期的遗留物。”^②发达国家尽管更早实现工业化，但其民众也并未对工业文明有更深厚的感情。工业遗产只能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

在现代工业的故乡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对于初生的工业文明，普遍怀有疑惧与抵触的心态。狄更斯那些描写工业社会的阴郁的小说，可以视为反工业心态的一种代表。颇堪玩味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英国大批知识分子眼中的文化恰恰是与工业对立的。马丁·威纳（Martin Wiener）指出，在复古思潮影响下的英国美学领域，中古风气取代了现代主义。具有中世纪特征的哥特式建筑在英国复兴被认为是对工业革命的一种广泛的逆反。迅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吞噬着英国的传统，在泛滥于社会的怀旧心态下，古老的建筑物作为同过去联系的纽带而格外受到珍惜。^③因此，对于旨在保留工业社会记忆的工业遗产来说，不无尴尬的是，建筑遗产理念最初的兴起，正是为了抵制工业社会，阻止工业建筑与现代建筑对传统建筑的全盘替代。而讽刺的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无情推进，工业建筑本身也迅速淘汰更新，那些曾被嘲笑的工业建筑在丧失其功能后，竟也成了英国建筑保护主义者热衷保护的對象。^④对过时的工业建筑的保护，可以视为工业遗产保护的开端。不过，比起古代遗迹，工业社会遗留物的价值始终难以被工业社会的大众广泛认可与接受。一些欧美学者把当代欧美社会里对于废弃工厂的怀旧称为“烟囱怀旧”或“恋废墟癖”，用词可谓刻薄。^⑤然而，这种对工业遗迹的怀旧之情，终究还是小众之情。两位英国学者正确地指出：“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认真地保护工业遗产，而北美也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样做。尽管人们很早就开始尝试保存法国的一些废弃工业的残留物品，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废弃工业的遗留物品才被视为国家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遗产的价值迟迟得不到承认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⑥

英国是工业革命兴起的地方，也最早经历工业衰退和去工业化进程，与之相应的是，工业遗产的概念与实践同样最早诞生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的工业重镇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学者们创造了工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aeology）。伯明翰大学的迈克尔·里克斯（Michael Rix）首先在成人教育课程中推广工业考古学，带动了工业遗产作为一个单独领域的兴起。里克斯发表论文呼吁英国社会各界加强对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其理念在1959年得到了英国考古学委员会的认可。当年，工业考古学的研究者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希望政府可以资助国内工业遗迹的调查和认定，进而确认需要被保护的遗迹。1963年，《工

① Judith Alfrey and Tim Putnam: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Managing Resources and Uses*, p.2.

② Judith Alfrey and Tim Putnam: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Managing Resources and Uses*, p.9.

③ [美] 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王章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59页。

④ [美] 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第94页。

⑤ [美] 乔舒亚·弗里曼：《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李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⑥ [英] 戴伦·蒂莫西·斯蒂芬·博伊德：《遗产旅游》，程尽能主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业考古学导论》(*Industrial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出版, 正式宣告了工业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和管理领域的诞生。1973年, 英国工业考古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Industrial Archaeology, AIA) 正式成立。同年, 位于英国什罗普郡的铁桥谷博物馆(Ironbridge Gorge Museum) 建成。该地靠近伯明翰, 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 在此处发展并推广了煤转炭技术, 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基础。该馆开馆后不久就召开了有关工业遗迹保护的国际会议, “工业遗产”一词随后取代了“工业考古学”, 用以称呼英国的工业历史遗迹。1973年的铁桥谷会议还促成了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TICCIH) 在1978年诞生。1986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铁桥谷周边5.5平方公里的土地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用以铭记亚伯拉罕·达比的煤转炭技术出现后所带来的工业革命。^① 从这一历史进程可见, 工业遗产最初起源于英国老工业城镇的地方性怀旧心理, 由当地学者发展出工业考古学这一新的概念与理论, 经全国学术界认可后, 通过建设博物馆而将工业遗迹的保护落到实处, 最终形成工业遗产的概念, 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而铁桥谷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对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的一种权威认定, 有利于工业遗产这一概念及其承载的理念广泛传播并被公众接受。工业考古、工业博物馆与世界文化遗产, 也因此而与工业遗产紧密相连。

2003年7月, TICCIH在俄罗斯北乌拉尔市下塔吉尔镇召开会议, 通过了《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一般简称为《下塔吉尔宪章》。《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定义是: 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 这些遗留物拥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是科学上的价值。这些遗留物具体由建筑物和机器设备, 车间, 制造厂和工厂, 矿山和精炼处理遗址, 仓库和储藏室, 能源生产、传送、使用和运输, 以及所有的地下构造所在的场所组成。与工业相联系的社会活动场所, 如住宅、宗教朝拜地或教育机构都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下塔吉尔宪章》被广泛奉为工业遗产认定的最权威的标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 《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界定其实是相对宽泛的, 除了在工业中具有核心性的生产场所的遗存被视为工业遗产外, 辅助性的住宅和文化设施等也被纳入工业遗产范畴, 这就大大扩展了工业遗产的范围, 也使得工业遗产实际上被视为“与工业相关的”文化遗产。这一界定会将一些并不具有工业景观或工业风貌的建筑遗址视为工业遗产。而由于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 能够与工业相联系的社会活动场所极为广泛, 《下塔吉尔宪章》的定义在实践与操作层面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次, 《下塔吉尔宪章》明确指出了工业遗产的存在依据和保留依据具有一定的价值。在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中国的日常语境中, 人们经常将老旧厂房和废弃工业场所等笼统地称为工业遗产, 忽略了工业遗产与单纯的工业遗址或工业遗迹等工业遗存之间的区别。换言之, 工业遗产必须经过价值认定, 并非所有的工业活动的遗留物都能被称为工业遗产。不过, 由于工业遗产的价值认定本身具有主观性, 加上《下塔吉尔宪章》在工业遗产定义上的宽泛性与模糊性, 在日常语境里对工业遗产一词的泛化使用亦并非全无道理。

2011年11月28日, 在第17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① 朱联璧:《略论英国的工业遗产》, 载彭南生、严鹏主编:《工业文化研究》(第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144—147页。

^② 刘伯英、冯钟平:《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第156页。

and Sites, ICOMOS) 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联合准则: 工业遗产、构筑物、区域和景观的保护》(Joint ICOMOS-TICCIH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Structures, Areas and Landscapes), 简称《都柏林准则》(The Dublin Principles)。《都柏林准则》系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有关工业遗产界定的共识。^① 该《准则》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为: “工业遗产包括遗址、构筑物、复合体、区域和景观, 以及相关的机械、物件或档案, 作为过去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的工业生产、原材料提取、商品化以及相关能源、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的证据。工业遗产反映了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深刻联系: 无论工业流程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 均依赖于原材料、能源和运输网络生产和分销产品至更广阔的市场。工业遗产分为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维度, 有形遗产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遗产, 无形遗产包括技术工艺知识、工作组织和工人组织, 以及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财富塑造了社群生活, 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结构性改变。”^② 应该说, 《都柏林准则》对于工业遗产的定义比《下塔吉尔宪章》更为丰富和完备, 在关注工业建筑物等物质遗存的同时, 强调了包含精神文化的非物质层面的工业遗产。在对定义的阐释中, 《都柏林准则》分析了物质工业遗产与非物质工业遗产的辩证关系: “工业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内化于建筑或遗址自身中, 包括物质构造、部件、机械和布局, 以工业景观和书面文件以及记忆、艺术和风俗等无形的记录作为呈现方式。”^③ 目前而言, 《都柏林准则》对工业遗产的定义最具官方性与权威性, 是工业遗产认知与实践的重要基础。

2012年11月, TICCIH 在中国台北举办了第15届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通过了《关于亚洲工业遗产的台北宣言》(简称《台北宣言》)。该宣言认为亚洲的工业遗产有别于其他地区, 对工业遗产的定义有必要扩充, 应该包含工业革命前的工业遗产。亚洲的工业遗产强烈表现出人与土地的关系, 在保护的观念上应该突出这种文化特殊性。此外, 亚洲的工业遗产大部分与殖民势力及文化输入有关, 这些文化遗产都应予以保护。^④ 实际上, 强调工业革命前的工业遗产和肯定殖民输入型工业遗产这两点“亚洲特色”, 既与亚洲某些地区的地方经济特色有密切的利益瓜葛, 又与亚洲某些地区试图改变历史叙事的集体认同心态有直接的政治关联。例如, 在 TICCIH 主编的官方手册中, 一位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举出的工业遗产案例是台湾某村落的造纸业, 当地的该项造纸技术系 1880 年代从大陆传至台湾, 用竹子做原料, 以石压轮为工具, 产品主要用于祭祀活动, 一直持续到 1950 年代。^⑤ 很显然, 这只是一种与农事活动即“人与土地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手工业, 根本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业。不过, 考虑到工业考古学在英国诞生之初就将“工业”(industry)的范围追溯至石器时代, 此种对工业遗产定义的扩充亦不足为奇。但是, 工业遗产的认定与地区发展旅游观光产业有直接关系, 亦毋庸讳言。这也导致工业遗产定义的扩

① 该准则的中文版本经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马雨墨翻译、周岚审阅, 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发布于 TICCIH 网站, 网址见: <https://ticcih.org/都柏林准则-the-dublin-principles/>。

② 《都柏林准则》, 马雨墨译、周岚审阅, 载彭南生、严鹏主编: 《工业文化研究》(第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96—197 页。

③ 《都柏林准则》, 第 197 页。

④ 刘伯英: 《中国工业遗产研究的未来——我们的任务》, 载朱文一、刘伯英主编: 《中国工业建筑遗产调查、研究与保护》(五),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4 页。

⑤ James Douet, ed., *Industrial Heritage Re-Tooled: The TICCIH Guide to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Lancaster: Carnegie Publishing Ltd., 2012, p.159.

充并非一个纯理论问题。至于美化殖民政权和殖民时代的工业建设，其政治认同的指向性就极为明显了。事实上，亚洲某些工业遗产充满历史与政治争议。例如，被评为世界遗产的日本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就因为涉及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强制征用劳工，遭到了韩国的强烈抵制。2014年，韩国国会在一项相关决议中提出，日本申报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不仅违反了世界遗产登记的基本精神，还将侵略的历史正当化”，是一种“欺骗人类普遍价值的行为”。^①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说，韩国的抵制理由是充分的。然而，申报世界遗产牵涉复杂的国际文化政治，日本最终还是申报成功了。这表明工业遗产一旦进入文化层面，就超越了单纯的物质遗存，不可能价值中立。进一步说，包括 TICCIH 与 ICOMOS 在内的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客观性与公正性不是绝对的，其制定的标准与颁布的准则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要考虑到与具体的国家利益是否相违背。

自 21 世纪以来，工业遗产的概念就逐渐传入中国并流行开来。2006 年 4 月 18 日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举行，发表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简称《无锡建议》），可以视为中国工业遗产事业的一个里程碑。检索中国知网，在 2006 年以前，篇名中出现“工业遗产”的中文文献仅区区 13 篇，其中大部分讨论的是借鉴德国等国经验开展工业遗产旅游。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在引入工业遗产概念时有着较强烈的现实经济动机。工业遗产研究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偏重应用与实践。2006 年，相关文献共发表 22 篇，超过从 2002 年到 2005 年的总和。此后，中文世界有关工业遗产的文献逐年增长，2009 年的年度发表量突破两位数，达到 111 篇，但总的来说涨幅较为温和，到 2019 年，相关文献发表总数亦不过达到 354 篇。当然，考虑到一些论文发表在专业集刊如《工业文化研究》《产业与科技史研究》上，而这些论文并未被知网收录，故实际文献数量更多。但不管怎么说，比起讨论“工匠精神”等工业文化概念的文献数量之庞大，工业遗产的研究与探讨在中国还是非常小众的。

2006 年的《无锡建议》主要是由文物部门提起倡议的，体现了较强的文物保护倾向。《无锡建议》对工业遗产的界定与《下塔吉尔宪章》相仿，重点强调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遗产受到了各种威胁，包括工业外迁导致城内旧工业区废置、传统工业衰退导致不少企业关停并转、未被界定为文物的工业建筑物正急速消失等。因此，《无锡建议》呼吁：（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呼吁全社会对工业遗产的广泛关注”；（2）“开展工业遗产资源普查，做好评估和认定工作”；（3）“将重要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4）“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发挥媒体及公众监督作用”；（5）“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6）“鼓励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7）“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研究，借鉴国外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经验和教训”。^②这些建议，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在《无锡建议》对工业遗产的界定中，出现了“工业文化遗存”这一词语组合。这意味着，“工业文化”是一个可以用来建立工业遗产元理论的词语。

工业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是一个新兴概念。从构词的角度说，无论是英文中的“industrial culture”组合，还是汉语中的“工业文化”组合，皆早已有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词语

^① 关艺蕾：《日本工业遗产保护及开发概况》，载彭南生、严鹏主编：《工业文化研究》（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5—187 页。

^② 《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载《中国文物报》，2006 年 5 月 26 日。

并未被赋予专门的意涵，只是一种笼统的指称。2014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官方对于工业文化的认可，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在中心成立前，相关人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理论论证工作。可以说，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的介入，以及同期部分学者如严鹏的独立研究与教学活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自发自觉地尝试构建关于工业文化的体系化的理论。2016年，工信部的王新哲、孙星、罗民等相关作者撰写并出版了《工业文化》一书，这部超过48万字的专著既明确界定了“工业文化”一词，又从学术角度初步地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为了配合对《工业文化》的解读，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出版了系列丛书，其中的《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刻画了中国工业文化的历史进程。该书将工业文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认为“工业文化是一种致力于国家富强的创造意志，是工业发展的意识形态前提条件”。^①可以说，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工业文化研究正式起步。工业文化这个概念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并辅之以相应的自觉建构的理论体系，给了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事业以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和解释话语。2017年，工信部开始评选国家工业遗产，这标志着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逐渐从文博系统转向工业系统，而这给了工业遗产由凝结怀旧情绪转向成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一部分的可能性。怀旧与乡愁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心理之一，但记忆的存在，本身是为了使人在时间流中获取并维持存在感，在头脑中建立生存所赖之坐标系，从而引导人在时间中走向未来。工业遗产不能仅仅只是一种怀旧情结，它应该被纳入有效的产业政策，从而使工业文化真正能够为经济注入活力。

从工业文化的角度看，工业精神是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工业文化具有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工业遗产相应地也包含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两个方面。通常，人们会将非物质工业遗产理解为生产工艺、技艺以及操作过程等。这些知识有可能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与观念中，无法通过有形的载体呈现具体的过程。不过，从工业文化的本质出发，非物质工业遗产更主要的还是指工业精神。工业精神被定义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为工业生产活动提供深层次动力和支持的一种社会主导取向和共同价值观”，其内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文化和心理”。^②事实上，两百余年来的世界历史表明，对具体国家和地区而言，工业化并非一个不可逆的自然进程，无论是启动还是维持，工业化都需要强有力的精神因素给予支撑。此处所谓精神因素，也就是工业精神。研究工业创新的学者路风用通俗而有力的句子诠释了工业精神对工业发展所起的前提作用：“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③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本身就取决于瓦特、阿克莱特等人以创新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在19世纪英国工业的鼎盛时代，一大批传记作家和科普作家撰写了不同层次的读物，宣扬着创新、敬业、勤奋、专注、崇尚科学等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价值观。^④因此，工业革命的扩展需要辅之以工业文化氛围的营造。法国的工业革命也大大得益于圣西门鼓吹的实业精神。进一步说，这种无形的工业精神，能够满足工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体现工业遗产最核心的价值。毕竟，工业遗产的即时性与当下性，决定了它在

① 严鹏：《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页。

② 王新哲、孙星、罗民：《工业文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234页。

③ 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454页。

④ 严鹏：《工匠革命：制造业的精神与文化变迁》，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49—53页。

诱发人们思古之幽情方面的作用远不如传统文化遗产在这方面的作用。但换一个角度看，工业遗产的现实意义更大。对于那些仍在现代化征途中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工业遗产能够体现工业文化所包含的“富强”这一价值观，比传统遗产更具有将现代性(modernity)融入国族宏大叙事(national grand narrative)的国家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进一步说，工业遗产所见证的工业史值得被铭记的最大理由，就在于它包含了工业企业的艰苦创业与开拓奋进历程，以及企业艰苦奋斗背后的精神源泉。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技术不断换代，设备不停淘汰，生产场所也可能迁移，唯有内在的精神力量能够穿越时空得到传承，鼓舞一代又一代人去拓展工业革命的新边疆。各种有形的工业遗产就是无形的工业精神的载体，是激发后人工业精神的可依托之物。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遗产具有产业政策层面的意义和价值。

二、产业再造：后工业问题的产生与应对

工业遗产是产业演化的阶段性产物。不过，有必要区分两种类型的工业遗产：一种类型的工业遗产，是公众较为熟知的已经丧失原初工业功能的工业遗留物；另一种类型的工业遗产，是在长期保持原状的空间与设施中持续从事工业活动的工业企业或其附属部分，可称为“活态工业遗产”。活态工业遗产通常未进入企业或产业演化的本质性的新阶段，亦不存在工业衰退或去工业化的问题。然而，那些非活态工业遗产（即第一种工业遗产），处境就大为不同。非活态工业遗产必须应对的是一种“后工业”（post-industrial）问题。

工业经济的创造性毁灭机制决定了工业化或者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进程，而是会发生反复和具有倒退可能性的演化过程。“创造性毁灭”或“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使用的术语，用于形容现代经济也就是工业经济的特质：“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和工场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种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①熊彼特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但他所谓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工业经济，这从他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一家典型农场生产设备的历史，从作物轮作、耕种与施肥的合理化开始到今天的机械化装置——由传送机和铁路连接起来——是一场革命的历史。从木炭炉到我们今天炼钢炉的钢铁工业生产设备的历史，从上射水车到现代电厂的电力生产设备的历史，从邮车到飞机的运输史也全是革命的历史。”^②然而，工业的革命本身包含着技术上的自我否定，在发展之中蕴含着衰败。此外，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不断扩大终至覆盖全球的地理空间内展开，各种生产要素时刻趋向最有利可图的地点，引发工业地理的不断变动，在促成一些地区的工业兴起的同时，导致另一些地区的工业出现衰退。工业衰退正是工业设施变为丧失原有功能的工业遗存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说是非活态工业遗产在物质层面形成的经济前提。

只要扩大工业的范围，将手工生产的制造业与采掘业也看成是工业，则工业衰退乃至去工业化并非新现象。在工业革命前夜，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曾环游英国。在后来出版的游记中，

①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6—147页。

②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46页。

他写道：“事物的命运给予事物新的面貌，下层社会的生产改变了，引发了无数的小骚动；家族被养活或被替代，市镇兴起或衰落，制造业和贸易迁移着；大城镇衰退，小镇子崛起；新的市镇，新的宫殿，新的场所，每天都被建造着；伟大的河流和优良的港湾干涸了，变得无用；再一次的，新的港口开张，接纳河流，小溪开始通航，港湾在闻所未闻之地建起。”^①例如，梅德韦（Medway）附近的村庄，曾经有可观的制衣业，但到了笛福的时代，已经相当衰败，整个地区只剩下几乎不到10个裁缝。^②因此，工业衰退与去工业化本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可以说，只要地区间的经济竞争持续，工业发展和工业衰退就会长期存在，在不同地域交替轮转。对于那些工业衰退了的地区来说，必然会进入某种“后工业”状态。

不过，正如爆发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现代工业具有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内涵，工业革命之后的后工业亦具有某些新的特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衰退与去工业化开始更大规模地出现，部分学者产生了工业社会正走向终结的判断。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明确提出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概念。后工业社会不完全是个经济概念，但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最首要、最简明的特征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③。从1970年代初英美等西方国家工业衰退愈演愈烈的实态看，他所定义的后工业社会确实在兴起。经济学家通常以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动来构建经济演化阶段的模型。例如，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等人基于若干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案例指出，工业化的程度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从一般均衡的观点来看，工业化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特征。在此系统中，初级产品生产份额的下降由社会基础设施份额以及制造业份额的上升所弥补，服务业份额以不变价格计算则几乎不变。^④1960年代以后，制造业在最发达国家美国的经济中的地位出现变化，制造业部门的雇佣人数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⑤这一现象不只出现于美国，也普遍发生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根据钱纳里理论的逻辑，这就是一种工业化出现逆转的新的结构性变化。此类经济学理论给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以实证支撑，并使得人类社会看上去在经历一种主导部门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再转移到后工业即服务业的宏大历史演变。

然而，这种演变往往并非福音。人类的生存依赖基本的农产品与工业产品，这两大实体经济部门构成了社会存续的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工业革命既改造了工业或制造业，又革新了传统农业，使农业部门能以较少的从业者和日益萎缩的经济规模来供养庞大的非农业人口。换言之，在标准的工业社会里，农业部门已经工业化了。但是，迄今为止，服务业尚未以工业改造农业的方式来革新工业。相反，服务业部门的诸多产业系以为工业服务为其职能。进一步说，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尚未演进到能以极端萎缩的规模来供给大量必需品的程度。二战后发达国家主导部门由工业转向服务业的原因，虽然也不乏产业内在的变动，如技术革命等，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

①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1, p.44.

②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p.132.

③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④ [美]霍利斯·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3页。

⑤ Louis P. Cain, Price V. Fishback and Paul W. Rhod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83-184.

一种单纯的空间转移，即制造业岗位流向了要素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所谓的后工业就并不必然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演化新阶段，反而可能只是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经济权势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或“后工业”一词本身是个不甚严谨的概念，因为在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经济中，一个地区的工业衰退，往往意味着另一个地区的工业兴起；一个新兴地区的工业化，往往以一个老工业区的去工业化为代价。而工业的内涵本身也在时刻变化着。换言之，所谓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断裂，远不如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那么显著。目前的人类社会仍然是工业社会，后工业在某些地区确实反映了新的不可逆的产业演化形态，但在很多地方则只是原有经济体系被资本的转移击碎后所遗留的问题。众多非活态工业遗产，对于遗产所在地而言，正是待解决的后工业问题的最为直观的展现。

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后工业问题的实质就是产业再造问题，而这也是工业遗产在经济层面的实质性问题。工业遗产是一种典型的后工业事物，是制造业在地区经济中被服务业取代后的产物。进一步说，工业变为遗产后留下的空间经常被利用来发展服务业，这本身也是一种从工业向所谓后工业转变的产业演化。例如，19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开创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后工业主义，企业和劳动力从许多工业区撤离，当地的工业设施遗存最初吸引了艺术家和中产阶级士绅的注意，后来又经过连续的文化实验和创新，形成了以遗产景观和工业建筑环境为载体的后工业经济。^①在后工业经济中，设计、艺术等文化产业取代工业，占据城市经济的主导地位。一些学者指出，不同城市建立经济循环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竞争力的高低。例如，一位学者批评美国洛杉矶的城市领导层漠视知识经济，只专注于传统物流业和制造业，但洛杉矶很难把传统制造业从比美国成本更低的地区吸引回来。相比之下，旧金山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更加专业化且专业化质量更高的地区经济体，主要集中于要求复杂任务的知识经济活动而非中等工资、中等技能要求的经济活动，于是，旧金山将洛杉矶甩到了后面。^②可以说，在宏观潮流改变时，洛杉矶仍固守旧的经济循环，其经济活动自然面临着收益不断递减的趋势。英国的老工业区出现了相似的分化。在整个20世纪，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纺织业长期萧条并最终走向瓦解，其陶瓷业的专业化优势也不复存在，但伯明翰的珠宝业却始终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实际上，这是因为伯明翰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枪支业等在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中，无法与低成本地区抗衡，就和英国的棉纺织业与陶瓷业等一起走向了衰落，但珠宝业这一高附加值产业更依赖不可转移的技艺。^③换言之，所谓的后工业经济，实际上就是传统上依靠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地区，被市场竞争逼入了产业价值链高端或某些高度专业化的细分领域。一个地区如果迟早无法维持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旧经济循环，就应该及早转向高附加值或高度专业化的新经济循环。在这一转向中，如何处置废旧厂房等工业遗存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议题。只有当这些工业遗存能够进入新经济循环，完成产业再造，它们才能变成物质性的工业遗产。

工业化经常被与城市化相提并论，并被认为是城市化的重要诱因，不过，历史的实际情况要

① [加]托马斯·赫顿：《城市与文化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研究创新团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② [美]迈克尔·斯多波等：《城市经济的崛起与衰落：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教训》，刘淑红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209页。

③ [加]托马斯·赫顿：《城市与文化经济》，第286—290页。

复杂得多。从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性转变看,工业革命促成了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居住在城市里,就此而论,城市化确实是工业化推动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工厂成为新城镇的组织核心,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工厂相联结,并成为其从属。^①但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两种独立的历史进程,一部分城市的兴起的确是由工业发展带来的人口聚集促成的,另一部分城市的规模扩张则不受工业化左右,还有一部分城市虽然因为工业发展兴起,但工业衰退后并没有随之落败。要言之,城市本身有其经济循环机制,工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城市既可以建立在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循环的基础上,也可以将工业纳入更大范围的经济循环。当工业衰退出现时,那些经济循环不以工业为主体的城市,具有更大的缓冲余地;而那些以工业为本的城市,则要么努力建立新的经济循环,求得城市更新,要么就只能随着工业衰退一起衰败。

城市化独立于工业化,还表现为两者在经济演化中具有不同的要素转移机制。工业发展需要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与原材料等,其中,资本具有最大的流动性。工业与城市的关系,实际上是资本将其他生产要素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聚集起来从事工业生产的动态演化过程。然而,一旦资本发现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更加便宜或更加有利可图,它就会从原有的地区转移。资本的这种转移,实际上是大部分地区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是,资本是无形的,其转移较为容易,土地是无法转移的,固结在土地上的工业设施如厂房等也很难转移,这就制造出物质性的工业遗存。相比于资本和土地,劳动力的转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一方面,与土地相比,人是可以移动的,从理论上说,劳动力会随着资本转移,从工业衰退地区流向新的工业区;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人的转移与流动会受到很多限制,极有可能与那些废弃的工业设施一起留在衰退的老工业区,这就是被称为“锈带”的老工业区成为社会问题的原因之所在。假如劳动力与资本能够同步转移,使依赖原有循环的人能够进入异地的新循环,“锈带”的生成根本不会对人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也就不构成所谓“后工业问题”。工业遗产,说到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使那些不能凭借原有经济循环继续生活的居民,在无法迁移到异地的情况下,依靠新的经济循环谋生。因此,工业遗产的形成,在记忆凝结之外,终究是要依托产业演化与地区经济循环重构的。事实上,倘若工业遗存尤其是物质性的工业设施遗留物无法进入地区经济的新循环,就很可能被视为缺乏价值的废弃物被摧毁,也就无法成为得到保留的工业遗产。反过来说,工业遗产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地区产业再造可资利用的要素。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活态工业遗产随着时间推移,同样会产生无法避免的演化。其结果,要么成为某种新的产业的一部分,要么就彻底失去价值而被遗弃,成为等待被夷平或风化的废墟。

工业与工业遗产始终面临着地区经济节奏变更的冲击,这并不表示地区管理当局只关注经济而不关注文化。不过,一般而言,地区管理当局只支持对地区经济发展有利的文化活动,或者更热衷于那些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文化活动。有学者将现代城市经济比喻为“增长机器”,称“对地方增长的称颂赞扬持续性地成为地区文化的主题”,而“增长机器热切地支持各种各样能支持当地建设的文化团体”,并“鼓励那些可以将社群情感与地方增长目标联系起来的活动”。^②换言之,在现实条件约束下,工业遗产的形成,要取得增长机器的支持,或者成为增长机器的一部分。工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② [美]约翰·洛根、哈维·莫洛奇:《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陈那波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

业遗产终究不同于普通文化遗产，更不等同于文物，它是文化与经济相协调而取得价值平衡点的产物。工业文化是工业经济重要的内核与外显，它滋养工业经济，又依恃于工业经济。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出发，丧失原初工业功能的非活态工业遗产，必须继续对工业经济起到某种作用，才能继续被纳入工业文化。产业再造使工业遗产在物质上得以保留，但只有当工业遗产所蕴含的工业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时，工业遗产才能作为工业文化的一部分，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劳动教育：发挥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工业的本质就是一种劳动。制造工具并运用工具进行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的能力之一。而劳动工具自身的演化最终缔造了现代工业。工业文化具有崇尚劳动的价值观，因为只有劳动才能带来工业发展。“工业”（industry）一词从15世纪就出现在英文里，但那时所谓的“工业”和今天一般意义上所称的工业完全不同。根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考证，industry有两种主要意涵，其一为“人类勤勉之特质”，其现代用法的形容词为industrious，其二则为“生产或交易的一种或一套机制（institution）”，其现代用法的形容词为industrial。^①故而，industry一词最初指的是勤勉这种伦理品质，直到18世纪才开始指“一种或一套机制”，而18世纪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勤勉是一种最基本的劳动伦理，英语里“工业”一词的原始含义可以追溯至勤勉，意味着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工业与劳动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工业与劳动的密切关系，使崇尚劳动的价值观成为工业精神的一部分。换言之，开展劳动教育，就是真正在教育中落实工业精神。可以说，劳动教育是促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工业文化的发展也会为劳动教育提供动力与资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劳动相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源远流长。例如，有学者将中国的劳动教育追溯至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耕读传家”，称：“古代先民将‘耕’和‘读’结合起来，希望拥有耕读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因此白天从事农业劳动与晚上挑灯读书共同构成了我国独特的耕读文化，这与我们所强调的实践和学习相统一的劳动教育是不谋而合的。”^②这种观点将劳动教育视为书本学习与劳动实践的结合，并构成特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实际上，劳动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为了培养人格健全的劳动者，而这种培养方式首先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塑造。就此而论，传统文化中对“劳心”与“劳力”的区分及其高下评判，并不能真正导向对劳动的尊重与崇尚。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教育的确立，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实践基础。近代中国的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都倡导过劳动教育，其主张多与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相结合。黄炎培实践其教育理想的重要基地中华职业学校，规定学生入学时一律要写誓约书，其首条便是“尊重劳动（学生除半日工作外，凡校内一切洒扫、清洁、招待等事，均由全体学生轮值担任）”^③。黄炎培的理念，既延续了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中学习与劳动合一的逻辑，又赋予了这种逻辑新的意义，将其由一种生活方式的需要转变为理论上的自觉。

毋庸置疑，近代中国的劳动教育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给了现代劳动教育以

①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7页。

② 李珂：《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5页。

③ 转引自李珂：《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第30页。

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蓬勃的生命力。劳动与生产决定了人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①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既是平凡的，也是神圣的。劳动的平凡性，体现于其无所不在；而无所不在的劳动之须臾不可或缺，恰恰又赋予了劳动以神圣和伟大。这是劳动亦凡亦圣的辩证法。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是，在剥削体制下，劳动者被贬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②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伟大意义，就在于要使劳动者和其劳动产品实现统一，使劳动重归光荣。劳动是光荣的，因为劳动塑造了人本身。这是必须通过教育来传递的正确价值观。也只有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社会才能通过劳动为劳动者自身创造幸福。劳动教育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先进性之内涵与体现，又巩固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的体系中，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总结极具启发性。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给苏联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其实践也脱离不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特性，但其理论是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苏霍姆林斯基并没有将劳动教育简单地看成职业技能培训或实践教学，而是将劳动教育上升至道德教育的高度，指出劳动教育的意义在于使学生“做好劳动准备”，而“所谓做好劳动准备，首先是指在道德上做好准备以及要有热爱劳动的思想”。^③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理论既包含体力劳动，又包含脑力劳动，而他也看到了这两者在教育和生活中的矛盾性。苏霍姆林斯基敏锐地意识到了，随着苏联经济社会的发展，脑力劳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在学校教育中，对于脑力劳动的培养可能会带来对体力劳动的贬低，而这一问题无法通过简单地提高体力劳动教育的比重来解决，只能培养学生重视体力劳动的价值观。他写道：“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所培养的而且也应当培养的学生对于脑力劳动的热烈追求，本身就蕴藏着轻视体力劳动的危险。出现这种矛盾是难免的……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单靠机械地增加学生体力劳动的分量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努力做到使学生所完成的体力劳动进入他们的精神生活，占据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④换言之，重要的是使学生在体力劳动的过程中认识到体力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这就需要在引导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实践的同时，进行理论上的讲解和教育。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苏霍姆林斯基认识到劳动教育只能是一种引导和建构的过程，不可能指望学生自己在劳动实践中自发地产生崇尚劳动的意识。相反，他指出了在劳动教育中缺乏理论学习的危险：“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对于真正的劳动，儿童感到的失望比他感到的疲劳还来得更早些。只有当儿童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的创造作用，认识到劳动的社会意义时，才能培养出他对劳动的真正的爱。如果缺乏这种自觉的因素，强制只能碰上学生的抵制情绪，强制的力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③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萧勇、杜殿坤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④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11页。

量越大，抵制的情绪就越强烈。”^①劳动教育的关键在于使学生意识到劳动的意义，而劳动的意义与肉体所进行的劳动过程是独立的，必须在思想层面加以确认。

如此一来，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全方位的教育，并非简单地让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或动手实践，而是在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努力渗透崇尚劳动的价值观，培养学生对劳动的热爱。例如，对于通常被认为与劳动教育无关的人文学科，苏霍姆林斯基也看到了其在塑造学生劳动意识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工业文学的重要性：“阅读反映工业生产劳动者的文艺作品，对其余一些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都自觉地决定在毕业后去当车工、钳工、电工等。”历史课如果用来讲授工业史，同样能够贯彻劳动教育：“历史课程（特别是苏联历史）对于教育学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历史课程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的意义就在于：首先通过表现人民的劳动来揭示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讲清关于苏联人民在劳动中的忘我精神跟在战场上建立功绩具有同等价值的思想。”^②苏霍姆林斯基一再反对将劳动教育简单化为技能培训或参加体力劳动。他认为人文学科只要设计适当的教学内容，就可以发挥劳动教育的功能：“让学生做好生活和劳动的准备，绝不只是限于掌握一些范围狭窄的技能和技巧。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做好劳动准备的工作中的地位和教育价值，取决于教材内容本身有教育性和方向性，它与学生的思想感情、积极活动能够联系起来。”^③基础教育毕竟不同于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中的劳动教育不可能系统传授职业技能，而只能是始终以塑造学生崇尚劳动的精神与价值观为其要旨。

苏联长期奉国家工业化为国策，因此，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中，引导学生对工业产生兴趣和热爱占了很大比重。对于在自然科学的教学中贯彻劳动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的智力方面以更鲜明、更使人信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大大增强了物理学的教育可能性。”^④在这一领域，实践是重要的。他举出一位物理教师的例子。该物理教师在六年级讲解物体和物理现象概念的第一节课上，通常都带领学生参观，以期通过揭示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的实质来提高学生对劳动过程的兴趣。1952—1953 学年初，学生就去参观了机器拖拉电站的机械工场。另外有一次，当教师以金属切削机床的构造为例，讲解了直线运动、旋转运动、运动的传动、摩擦、平衡等现象后，参加小组活动的学生们不满足于仅仅理解机床的工作原理，还竭力想知道如何操纵机床以及使用机床去进行金属加工。^⑤这就将劳动教育与工业教育直接结合起来了。不过，从劳动教育的本质角度出发，劳动教育与工业的结合，主要还是工业精神在日常教学中的落实。苏霍姆林斯基在讲解如何通过历史课贯彻劳动教育时，举出的就是工业史教学的内容：“在教‘苏联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十年级）这一课题时，教师上了一节题为‘苏联人民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年代里的劳动功绩’的课。这节课上列举了许多反映工人和农民的劳动英雄主义精神的鲜活事例。教师讲述了关于沃尔霍夫水电站的建设者的劳动情况，关于第一台国产拖拉机和第一辆国产汽车的制造经过，关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和土耳其斯

①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 11—12 页。

②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 93—94 页。

③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 95—96 页。

④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 103 页。

⑤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 105—106 页。

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者的事迹，援引了关于第一批劳动突击手的劳动情况的生动例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为普通的苏联人的劳动的历史而呈现在学生面前，使他们形成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要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①工业精神是靠劳动精神支撑的，工业精神通过劳动教育来落实，可谓顺理成章。反过来说，劳动教育也包含对工业精神的传承。由于工业精神是工业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所以，将工业遗产引入基础教育中，可以充实和拓展劳动教育。

学习既是一种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也是一个心理的获得过程，发生在个体互动所蕴含的冲动和影响之中。^②心理学家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学习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教育中。新的学习科学关注人的认知过程，将人类看作由目标指引、积极搜寻信息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带着丰富的先前知识、技能、信仰和概念进入正规教育，而这些已有的知识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关注以及组织环境和解释环境的方式，也影响着他们记忆、推理、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的能力。^③总而言之，学习就是一个学习者以一定的动机驱动，吸收外部信息，并将外部信息与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进行整合，使外部信息内化于已有知识体系的知识迁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动机既起到启动整个学习过程的作用，又起到维持学习过程，使其持续进行直到实现某种结果的作用。因此，学习动机在学习过程中极为重要。学习者对摄取新信息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投入，对学习过程的产出有直接影响。教育者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使其产生自觉主动去搜寻信息的学习动机。学习者接触的外部新信息的内容本身的吸引力高低也会影响到学习动机的强弱。对于劳动教育，工业遗产可以成为一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具有吸引力的资源。

广义的课程资源是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的各种因素，它是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例如，历史课程资源指有利于历史课程目标实现的各种资源的总和，比如历史教材教参、历史读物、历史文物、历史遗迹、历史题材的影音资料、历史人文景观、历史专家学者等。^④以中学历史教学来说，既包含工业历史遗迹又能反映工业史的工业遗产，无疑是一种课程资源。

苏霍姆林斯基通过实践总结道：“少年和青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向往那些包含着崇高思想（建功立业、与自然做斗争、美好的友谊和爱情等）的活动。学校的任务就在于，要使从事创造性的、内容深刻而丰富的劳动思想，也像建功立业、到远方去旅游的幻想一样占据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善于对学生的思想施加影响，使劳动和劳动者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⑤换言之，教育者要使用适合青少年心理特点的教学内容去激发青少年学习者对于劳动的兴趣。这样一种教学内容既不应该是枯燥的说教，也不能完全运用抽象的理论讲解，而要使用生动的案例去具体展现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并使学生产生情绪上的积极感染。工业遗产中的非物质部分如工业史等，可以为劳动教育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苏霍姆林斯基就曾感慨劳动教

①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94页。

② [丹麦] 克努兹·伊列雷斯：《我们如何学习：全视角学习理论》，孙玫瑰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③ [美] 约翰·布兰思福特等：《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程可拉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④ 杜芳主编：《新理念历史教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⑤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23页。

育课程资源的匮乏：“起初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体现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鲜活事例，然而在文艺作品和政论作品中却很少以生动形象的形式表现它们。很难找到一些篇幅不长、情节完整的作品能够把活生生的人，把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劳动者放在首要地位来加以描写。”^①他举了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老工人事迹作为案例来塑造学生劳动观念的成功例子。一个学生在听取了老工人的事迹后，赞叹道：“这是些真正的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事迹写成书呢？”^②在苏霍姆林斯基提供的教学案例中，老工人的劳动事迹就是一种非物质工业遗产，是体现了工业精神的工业史，实现了培育青少年学生劳动观念的教育功能。因此，在劳动教育中，工业遗产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激发并维持学生学习动机的新信息。

作为教学讲授内容的工业遗产主要是非物质的，构成了学习者所要学习的内容（即外部新信息）。除此之外，物质工业遗产也可以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为学习者营造容易吸收外部新信息的学习环境。苏霍姆林斯基的研究表明，尽管劳动是生活的基础，但对现代社会的青少年学生来说，由于在正式参加社会劳动前要经历漫长的学校学习阶段，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具有陌生感的。同样的，尽管工业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但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工业通常是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陌生之物。因此，工业遗产可以起到直观地展示劳动的作用，但工业遗产本身也必须直观而容易理解，才能激起学生较强的学习动机。物质工业遗产是有形的，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认识工业，使其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工业的具体形象，降低学生理解抽象概念与知识的难度。学习过程最终要实现的是知识迁移，就是将陌生的信息变为熟悉的信息。物质工业遗产作为课程资源，起到的就是增强陌生信息的可感知度与易理解度的功能。对学习来说，熟悉就意味着可感知与易理解。将青少年学生带到工业遗产实地参观学习，有助于为学生创设熟悉工业文化的学习环境。

事实上，当工业遗产发挥劳动教育课程资源的功能时，其物质部分与非物质部分可以结合在一起。学生可以在物质工业遗产的现场学习其所包含的劳动精神等非物质工业遗产的内容。中信重工就是一个合适的课程资源案例。中信重工的前身洛阳矿山机器厂（简称洛矿）是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其申报为国家工业遗产的核心物项中，就包含有焦裕禄的劳动成果。1965年12月，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他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人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我在工人师傅的帮助指导下，还学会掌握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参加产品的组装。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维护团结，遵守纪律，热情豪爽，坦率真诚，说实话，干实事，肯钻研，讲效率。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③习仲勋的回忆，是中信重工重要的非物质工业遗产，现身说法地阐述了劳动的价值与意义，是在中信重工的物质遗产空间里讲授劳动精神的天然教材。

因此，工业遗产作为劳动教育与工业文化教育的课程资源，同时为课堂学习和户外研学服务。

①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25页。

②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48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文集》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7页。

在课堂学习中,青少年学生主要通过教师的讲授,利用非物质工业遗产了解工业的历史以及蕴藏于工业精神中的劳动伦理,树立尊重劳动与崇尚劳动的正确价值观,掌握有关劳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在户外研学中,青少年学生被教师带至物质工业遗产场所实地参观考察,参与各种与课堂学习相衔接的实践活动,直观地认识工业文化,并通过实践培养劳动观念与劳动素养。课堂学习与户外研学是相辅相成的,遵循着用理论引导实践再由实践强化精神的认知规律。有西方学者指出,利用工业遗产作为课程资源,要在户外与教室之间形成一个闭环:“户外教学的目标首先在于学会如何搜集材料,回到教室后,从户外搜集来的信息要被共享和整理,以便被用来探索、研究和透视课程的主轴:空间,技术与社会。”^①在劳动教育中,课堂学习即言语讲授与户外研学即劳动实践也是辩证统一的,恰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当学生在崇高的思想鼓舞下从事长期的劳动以后,他们对言语教育的接受性就大大加强了。观察的结果表明,在作用于学生精神世界的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相互依存性和统一性。”^②当运用工业遗产作为课程资源进行劳动教育时,非物质工业遗产与物质工业遗产分别为言语讲授和劳动实践提供了有用的资源,发挥着其作为文化遗产应有的教育功能。

四、余论

工业遗产是在时间长河中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但作为工业文化的一部分,其最大的价值是面向未来去传承工业精神。工业遗产既与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承载着国家的集体记忆,又作为一种地方性存在,与其所在的具体地区休戚与共,成为地区振兴的重要环节与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于是,作为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工业遗产既代表了历史,又指向着未来;既凝结着国家记忆,又展望着地区振兴;既塑造着工业社会的文化,又参与着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循环。多层次的价值体系,赋予了工业遗产独特的魅力,而这也正是保护与传承工业遗产的意义所在。

从工业本身的角度出发,工业遗产是工业在演化进程中的产物,是工业文化的一个维度。工业遗产是工业社会集体记忆的凝结,是工业文明对自身历史的记录。这种记录既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所谓无意识的记录,是指那些偶然保留下来的老厂区、废厂房、旧机器等物质性的工业遗存,本身就见证过历史,蕴含着文化,是无声的岁月见证。然而,作为无意中保留下来的工业遗存,它们的价值等待着人们去挖掘,它们的意义必须由人去赋予,才能转化为真正的工业遗产。而所谓有意识的记录,则是指人们出于某种目的,特意将某些物质性工业遗存保留下来,同时将这些物质遗存背后的故事记录下来并进行传播,使遗存的保留具有一定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些得到保留的物质遗存就真正体现出了文化。所谓文化,始终是由人类活动创造的,并以某种方式记录人类的活动。毫无疑问,所有的人类遗迹均能反映某种文化,而这也是各类文化遗产存在之本意。对工业遗存来说,其所能反映的文化有可能是多样的,因为人类的活动本身是多样性的。但是,工业遗存区别于其他人类遗迹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其值得保留的最充分的理由,仍在于其反映了别种遗迹所不能反映的工业文化。因此,工业遗产分为物质性的与非物质性的两大部分,而其核心价值,则为可以影响人类活动的非物质性的部分,也就是那些连接着人

^① James Douet, ed., *Industrial Heritage Re-Tooled: The TICCIH Guide to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210.

^② [苏联] B.A. 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第37页。

类工作、生活、情感与生命的历史和文化。这样一种历史与文化，是可以传承于后世的。人们建造纪念碑，并非为了记住石碑本身，而是为了让石碑记住人自身的事迹。

迄今为止，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性的现象，工业化是国家迈向富强的不二之途，工业经济则是国家间竞争的物质基础。因此，工业遗产与国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国境内，存在价值不等的各类工业遗产，其中就包括可以参与塑造国家集体记忆的国家级工业遗产。国家级工业遗产应该在一国工业史上具有重要性，在行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或典型性与代表性，并有较为完整的物质遗存，充分将非物质工业遗产与物质工业遗产结合在一起。唯其如此，国家级工业遗产才能够通过历史工业建筑等物质遗存的展示，发挥记录国家工业历史与传承国家工业精神的作用。国家在工业遗产中的存在感，对于那些后发工业化国家，如东亚的日本等，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后发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被动地卷入工业革命时，本身也往往面临国家生存的危机，其工业化与现代国家建构是同步的，甚至直到今天都仍在继续这两大历史进程。这就赋予了后发展国家的工业遗产以更多的家国情怀。学习历史终究是为了创造未来。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也必须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遗产。

第一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第二作者系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第三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